

改革开放30年上海市的外来人口 和农民工动态研究^①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Migrants in Shanghai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Er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Micro—datasets of Shanghai

严善平

【摘要】 本文利用包括作者参与开发的大量微观数据,动态描述上海市外来人口及农民工的总体形象,特别是他们的变化过程。全文分4个部分:①概况描述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市的人口变动及其主要特征;②利用有关数据,实证分析外来人口、农民工的基本属性和居住空间的变化;③定量分析外来就业人员的工作、工资等情况;④简短的小结。

【关键词】 外来人口 农民工 居住 就业 工资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 pictur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migrants living in Shanghai, especially its change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by using several micro-datasets conducted by ourselves.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parts. Part I reviews the population change in Shanghai. Part II reflects mainly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migrants. Part III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and wage of migrants quantitatively. Part IV offers a brief conclusion.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migrants, living, employment, wage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都市,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

地。近30年来,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RDP)扩大了50倍。上海经济高度增长的源泉何在?丰润的外资不可否认,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也同样重要。本文的分析对象就是那些被称为农民工的外劳以及他们的家人。规模庞大、但实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口,他们是在现代大都市里发展壮大的?由于他们的参与,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特殊群体的基本属性、生活空间、就业、工资待遇等有哪些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特征又是怎样变化的?搞清这些问题,可以加深我们对农民工问题的理解,也可以为我们考虑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提供必要的基础材料。

所谓外来人口,是指那些在非户口登记地暂住的人群,包括以就业等为目的的成人和随迁的被抚养家属。在确定外来人口数量时,还有个暂住时间长短的问题。人口普查一般把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定义为暂住人口,即流动人口,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根据需要,未满半年的流动人口往往也被纳入分析对象。

早在1980年代初,上海就已经存有大批的外来人口,其中包含相当部分以就业为目的的、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群体。在人口流动还被严格限制的1980年代,出于对流动人口管理上的需要,上海市有关部门1983年首次组织了全市流动人口调查。此后,市统计局、公安局、社科院等部门密切配合,不定期地进行了七次全市调查,积累了大批一手资料,出版了多部调研报告^[1-3]。有关学者针对外来人口的就业、工资等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公开发行了研究成果^[4-7]。2003年,笔者曾与上海社科院人口所合作,对上海的户籍居民和外来人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分别为1500人),就大城市劳动市场的基本结构

作者:严善平,日本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① 本文为日本桃山学院大学特定个人研究费的研究成果(课题名称为“中国的劳动移动与劳动市场研究”)。

和机能作了较为详细的实证分析^[8-10]。2009年,我们采用同样的问卷和调查方法,再次对上海的户籍居民、外来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

通过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了解不同时期上海外来人口及农民工的很多断面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特殊人群的变化过程却不十分明显。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利用各种可利用的调查数据,动态描述上海市外来人口及农民工的总体形象,特别是他们的变化过程。全文的构成如下:第一节概况描述近30年来上海市人口变动及其主要特征;第二节利用既有调查的汇总材料,或对微观数据进行整理,重点分析外来人口、农民工的基本属性和生活情况,包括他们的年龄、教育、在上海的居住时间、居住空间等;第三节重点分析外来就业人员的工作情况、工资水平等。

1 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口变动

众所周知,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几乎没有迁居的自由。1953年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56年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家对城市居民实行统一的用工制度,1958年实施户口登记条例,同年还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体制。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国家计划安排,个人是无法擅自离开所属单位在他乡谋生发展的。

改革开放以后,体制外的空间变大。个人可以搞个体经济,吃饭也用不着粮票。为了得到更多的收入,部分人远离家乡,去城市、发达地区开始了打工生活。随着沿海

经济的发展,外资源源不断流入境内,就业机会迅速增加。早先打工的人们获得了发展,由此引发了民工潮,引发了一批又一批的农村青年外出打工。这就是农村向城市人口转移的历史背景。

上海市的人口变动怎样呢?表1、表2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成,反映了近30年来上海市人口总量及其内涵的变化,也可以说,它是改革开放时代我国大城市人口变动的一个缩影。上海的户籍人口在1983~2008年的25年中,增加了177万人,增长率为14.8%,大大低于同期全国的28.9%。但如果把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流动人口包括进去,同期的人口增长率高达58%。实际上,目前在上海的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有500多万。每100个常住人口中,就有27人没有上海户口;或者说,与100个户籍人口相对应流动人口是38人。要是把未满6个月的也算进去,流动人口总量要增至640万人。显然,流动人口已不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社会存在。

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开始大规模出现,并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据1988年的抽样调查推算,全市的流动人口达141万人,其中来自外地的106万人,占75%(另外25%是上海郊区的农民)。不过,此时的流动人口中,农业人口比重不是很高,大约占全体的一半(另一半为外地的城市居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比重也只有60%左右(另外40%主要是考察、学习、培训、开会、探亲、治病、旅游等文化型或社会型流动人员)。但在随后的10年中,流动人口总量倍增,来自外地的比重持续上升,达86%,从事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也上升至75%左右。

上海市的户籍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

表1

年份	户籍人口 (万人)	流动人口 (万人)	来自其他地区的流动人口		农业户籍所占比率 (%)	从事经济活动的 比率(%)
			总数(万人)	占户籍人口比(%)		
1983	1194.0	50				
1984	1204.8	70				6.6
1985	1216.7	134			25.1	
1986	1232.3	165			45.4	23.0
1988	1262.4	141	106	8.4	47.6	61.4
1993	1294.7	281	251	19.4	67.3	75.6
1997	1305.5	276	237	18.2	52.1	74.5
2000	1321.6	387	387	29.3	85.3	73.4
2003	1341.8	499	499	37.2	80.0	72.1
2005	1360.3	581	581	42.7		

注:流动人口指在本市内的区县之间以及在上海市和其他省市区之间发生流动而没有迁移户口的人员。2000年及以后的数字不包括本市内的流动人口。

(资料来源:1983~1993年的数字来自王午鼎主编(1995)、1997年来自张声华主编(1998)、2000年、2003年、2005年来自周海旺(2009)等^{[2][3][7]}。)

上海市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构成变化

表 2

年份	2000年	2003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1.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1608.0	1711.0	1778.4	1815.1	1858.1	1888.5
1) 户籍人口 (万人)	1309.0	1327.9	1340.0	1347.8	1358.9	1371.0
2) 流动人口 (半年以上) (万人)	305.7	383.1	438.4	467.3	499.2	517.4
占常住人口比率 (%)	19.0	22.4	24.7	25.7	26.9	27.4
占户籍人口比率 (%)	23.4	28.8	32.7	34.7	36.7	37.7
2. 流动人口总数 (万人)	387.1	498.8	581.3	627.0	660.3	642.3
1) 常住流动人口比率 (%)	79.0	76.8	75.4	74.5	75.6	80.6
2) 未过半年的居住者数 (万人)	81.4	115.7	142.4	159.8	161.1	124.9

注：长期外出的户籍人口除外。半年以上指在上海的居住时间，与国家统计局的定义（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不一样。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电子版）)

2000年以后，流动人口调查排除了上海户籍居民的本地流动，统计局公布的相关统计也只有非户籍的流动人口。由此可见，近10年来，所谓的流动人口主要指那些没有上海户口的外地人。本地居民流动也好，不流动也罢，已不再是什么大问题。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同年的上海外来人口中持农业户口的占80%。该比率近年来略有下降，差不多在75%左右。就是说，外来流动人口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农民问题，是那些持有农业户口的打工者由于不能迁移户口而遭遇种种不公正待遇的问题。把这类人群单列出来，统计他们的数量，调查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才有意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的户籍人口增长缓慢，而实际的居住人口迅猛增加。在同一个天空下，居住着两个性质不同的群体，一个是有户口的居民（主），一个是没有户口的居民（客）。在上海工作、生活，却没有上海户口，这意味着外来人口在就业、工资、社保等方面会遇到种种制度性的歧视，也意味着上海的劳动力市场、人们的居住空间存有人为的分割。实际上，农民工的重劳动、低工资、缺社保等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劳动者的权利保障等方面有所改善，但诸多的农民工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2 上海市外来人口的动态考察

2.1 外来流动人口的年龄特征

在日常生活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在不停地流动着，就学、就业、工作调动、婚姻、家属随迁等等。流动的主体往往因流动的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以就学、就业为主要目的的流动多发生在年轻阶层，从农村到城市、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乃人口流动的大方向。相反，退休人员往

往更加向往清静的环境，远离大都市，去宁静的郊区、乡村小城镇^[11]。每个人在地区间流动的概率是不均等的，通常，学历较高、男性、年轻、未婚等条件对人们的择业流动有较强的促进效果。

总体来看，上海市的外来人口具有鲜明的年龄特征。图1反映了2003年上海市户籍居民和2000年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可以很显然地看出，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是两个属性迥然不同的群体。在1300万户籍人口中，15~39岁年轻力壮的人口相对较少（33.5%），41~55岁的比重较高。2003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为，14岁及以下人口占24.1%，65岁及以上占7.1%，而同年的上海户籍人口分别为9.3%、14.9%。发达国家的少子化、老龄化现象在上海的户籍人口中已经十分明显。

相比之下，流动人口刚好弥补了户籍人口的不足。流动人口多集中在15~39岁年龄段，未满15岁的儿童、40岁及以上的人口较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在上海市的387万流动人口中，儿童占11.4%、15~39岁占73.3%、40岁及以上占15.3%。

图2是包含了流动人口在内的总人口年龄塔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另外一番景象。20~49岁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庞大，而年少、年长的人口数量绝对偏少。从社会整体来看，小孩的抚养、教育费用相对较少，同时，老人的护理费、医疗费和养老金所占比重也不是很大。其结果是，全社会的收入大大超过消费，大量的剩余资金通过银行、证券市场形成资本积累，进而转化为生产力，为经济发展作贡献。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们强调的不单单是外来就业人口在人口塔图中的核心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口是一个活性较高的群体，它与外地人口之间存有较高水平的双向流动，并通过这个流动过程，使整个群体的年龄结构保持相对稳定。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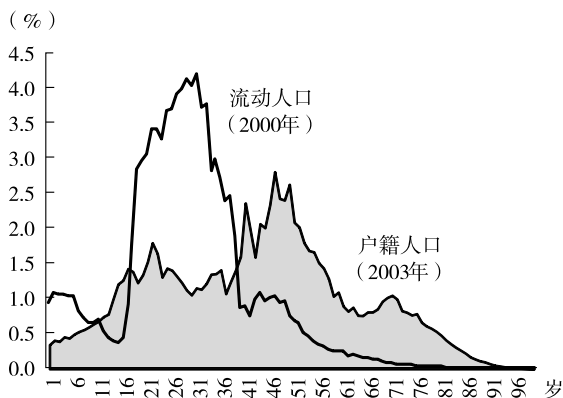


图1 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年龄百分比构成（上海市）
（资料来源：2000年上海流动人口普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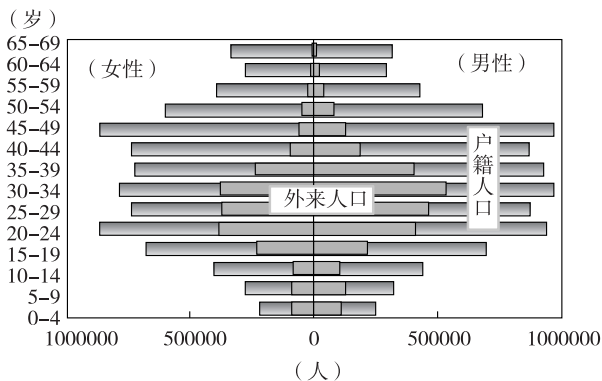


图2 上海市人口年龄塔图（户籍人口+外来人口，2003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统计年鉴（电子版）等数据制作）

是说，大批内地农村的初高中毕业生源源不断地涌入上海，寻找自己的青春梦。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终于会体验到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那就是，无论自己多么努力，绝大多数人也只能生活在与现代都市文明不太相干的边缘，在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挣钱糊口。于是，许多农民工到了30~40岁便纷纷被迫退出打工市场，无奈地回归故乡。如果我们把上海市的人口年龄塔图看作一棵巨松，就可以较为形象地理解上海经济的奇迹与外来就业者的内在关系：上海籍劳动力人口的供给虽然有限，但外地年轻人源源不断的流入为上海经济这棵巨松提供了充分的营养，使它保持了旺盛的活力，并茁壮成长。这一点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数据的支持。

2.2 流动人口的年龄变化

为了进一步考察上海流动人口以及外劳的年龄结构变化，我们搜集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部分调查的原始数据，并结合近年来自行设计的同类调查，得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图3是利用相关数据得到的结果^①，它们分别反映了总体流动人口和外来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外来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初到上海时的年龄分布等情况。具体地说，流动人口的年龄变化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流动人口高度集中于15~34岁，此前和之后所占的比率很有限。这一点与前面所述的2000年普查结果完全相同。外出是为了打工，户口的迁移依然要受到严

格限制，所以，小孩和老人的家属随迁比率甚小很合乎道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占流动人口比率最大的年龄层在不断地向上滑移。在1988~2003年的15年中，比率最高的年龄层从20~24岁滑移到了30~34岁，其峰值也从22%下降至18%。此间，上海的外来流动人口总数从100万增至500万（表1）。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农民工是构成流动人口的主体，他们在上海可以干到30~40岁，但再往上就越来越困难，一部分人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归故乡。

从图3b、图3c所表示的外来就业人口的年龄分布及平均年龄的变化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证实上述论断。随着时间的变化，外来就业人口相对集中的年龄层从20~24岁逐渐滑移至30~34岁，平均年龄从1995年的29.4岁上升为2009年的32.5岁。总体来看，男性较女性平均大2~3岁，并且这个年龄差距相对稳定。时隔14年，而外来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却只增加了3岁。这是为什么？可能有以下一些背景。在1995~2009年间，大批农村青年不断流入城市，导致了农民工群体的迅速扩大。其结果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并不随时间推移而同步向上滑移，平均年龄的增速也大大地延缓。

如前所述，在上海暂住的外来流动人口很少有机会获得上海户籍，转正为可以定居的上海居民。但这并不等于说，流动人口频繁地在上海和外地之间出入，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绝大多数外劳很可能在上海干到30~40岁

^① 图3a的数据来自上海市公安局、统计局等部门组织的流动人口调查（2000年为普查），调查对象包括在上海居住未满半年的全体流动人口；图3b~图3d中的数字分别来自上海社科院人口所等单位的外来就业人口调查（1995年、1999年、2006年），还有笔者与社科院人口所合作的单独调查（2003年、2009年的社区样本），调查对象为15岁或16岁以上的就业人员。1997年的外来就业人员与图3a的资料同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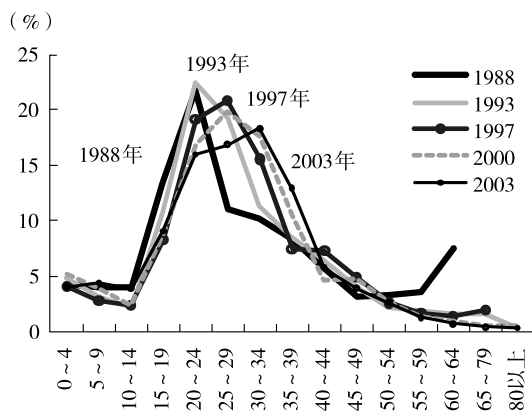


图3a 上海市流动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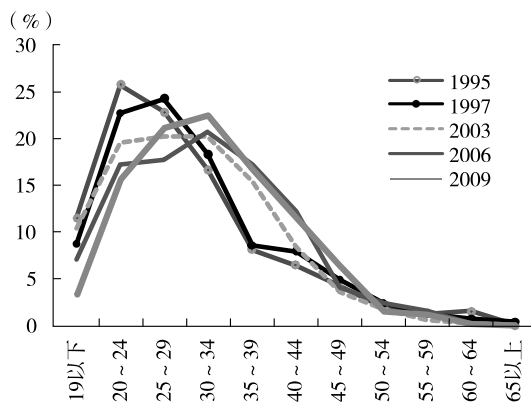


图3b 上海市的外来就业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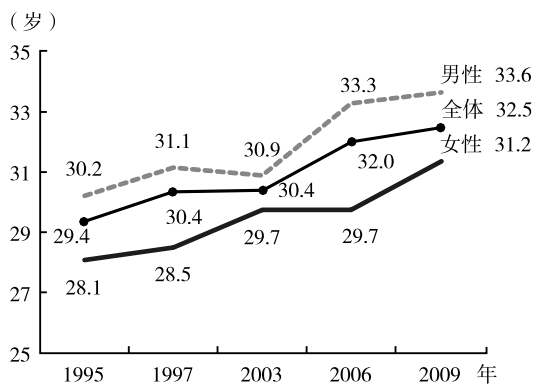


图3c 外来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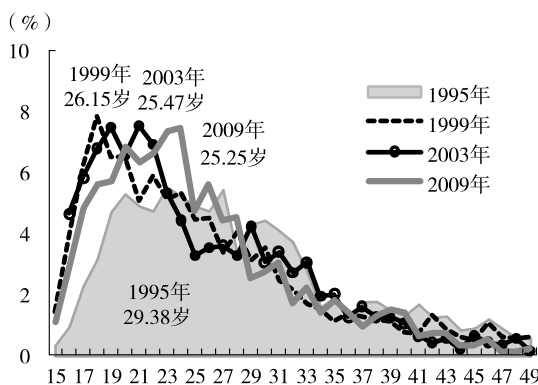


图3d 外来就业人口初到上海时的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王午鼎主编（1995）、张声华主编（1998）、周海旺（2009）、上海统计年鉴（电子版）以及各种问卷调查的汇总数据制作^{[2][3][7]}。）

才返乡，有的甚至更晚。尤其是2003年以来，各种惠农政策出台，与农民工的择业、工资、福利、迁居等相关的政策也相继付诸实施，在城市长期暂住的倾向越发明显。

图3d所示的初到上海时的年龄变化也很有说服力。外来就业人口初次到上海时的年龄分别是：1995年为29.38岁，1999年为26.15岁，2003年为25.47岁，2009年为25.25岁，呈现了递减倾向。这可能意味着，初次到上海打工的外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年轻化。在1990年代的广大农村，各个年龄层都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多样化的打工者也应运而生。到后来，年长者该走的早走了，还能外出打工的只能是那些刚从初中毕业的年轻小伙小妹。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突飞猛进，升学率从2000年的9.6%急速上升到2008年的23.2%。劳动市场的参与者中，初高中毕业的比率下降，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再就业的比率上升。这可能是导致2009年调查中23~24岁人口比率较高的主要原因。

2.3 外来就业人口的教育

我们可以从图4进一步确认外来就业人口的教育水平是如何逐渐提高的。本图中教育水平与教育年数的换算方法如下：未曾上过学0年、小学6年、中学9年、高中或中专12年、大专15年、大学及以上16年。2009年的a、b、c分别是农业户口样本926人、社区样本1009人、全体样本（社区和企业样本）1536人的汇总结果，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保持数字纵向可比性。

在1995~2009年的14年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就业人口整体素质有较大的提高，农业户口的平均教育年数达9.8年，即初中以上。如果包括非农业户口在内，平均教育年数为10.5年，比1995年多2.3年。如果把企业样本也放进来，平均教育年数更长，长达11.4年^①。同

① 对企业样本428人的汇总结果是：平均教育为14.0年，其中农业户口者12.3年、非农业户口者15.0年。

时,个人之间的教育差距呈现了缩小趋势。从图4b可以看出,外来就业人口的教育水平在不同年龄层都有一定的提高,在30岁以下阶层,上升的幅度尤为显著。这当然得益于教育事业的大发展,特别是1990年代末开始的高等教育的突飞猛进。

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进步。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加,不断增加的人力资本与高储蓄率下的高投资率相结合,必然地会产生大量的生产力。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大量高水平产业工人的形成密不可分。

2.4 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时间

流动人口不流动的事实已广为人知。逢年过节时,外出打工的人们返回故乡,共享天伦之乐,但绝大多数人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前,是不会弃城归乡的。这种趋势随着宏观政策环境的宽松而越发明显。表3告诉我们的就是在上海外来人口中发生的故事。

早在1988年,地区间人口流动还受到严格限制的时期,上海的外来流动人口中就有近一半人是居住了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有将近一成的流动人口在上海居住了5年以上。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常年居住上海的人口比率也不断上升。到2000年,大约8成的流动人口为上海市的常住人口,约6成人口居住1年以上。

3/4的外来人口在上海常住,却没有上海户籍。有的人长期住在自购的家里,统计上却把他们定义为暂住人口。这样的结果主要来自制度与现实的矛盾,其深层的背景是根深蒂固对农民歧视。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很多人直接来自学校,他们既没有务农的经历,也没有务农的技能,更没有务农的意愿。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农民工,仅仅因为他们的父辈是农民。所以,我们有必要正视现实,必须让这些常住城市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的年轻人,逐步地成为实实在在的城市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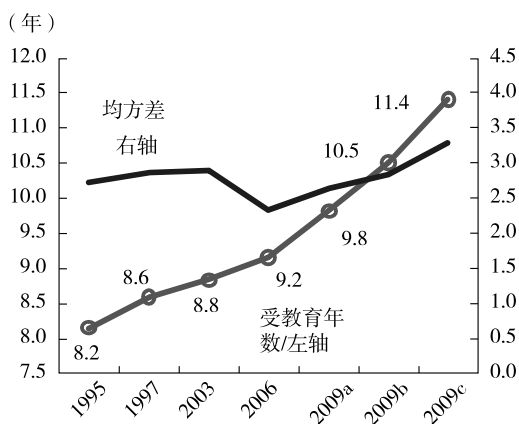


图4a 外来就业人口的教育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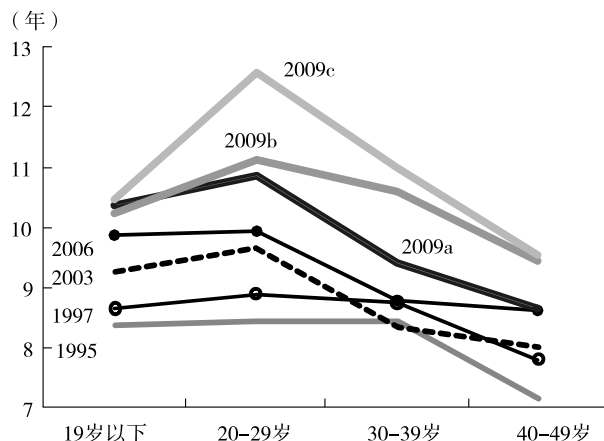


图4b 年龄阶层别的受教育年数

注:2009年的a、b、c分别为社区样本、总样本、企业样本的汇总结果。a的结果与此前的有一定的可比性。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制作)

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居住时间别构成 (%)

表3

	1988年	1993年	1997年	2000年	2003年	2005年	2007年
全体外来流动人口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未 满 6 个 月	52.7	50.7	28.7	21.0	23.2	24.6	24.4
6 个 月 ~ 1 年	15.5	20.4	19.5	21.6	12.2		
1 ~ 5 年	22.2	22.6	37.1	39.3	40.2	75.4	75.6
5 年 及 以 上	9.6	6.3	14.7	18.1	24.4		

(资料来源:周海旺(2009)等)

2.5 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

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全国的暂住人口19.2%住在镇上,这个数字较1995年的9.2%高了10个百分点。在这10年中,由乡村流向镇上的暂住人口比率从5.6%上升到14.1%,由乡村流向城市的比率从30.4%上升至35.1%,而在乡村之间流动的比率却从23.8%下降到12.1%。这表明,在暂住人口规模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大约1亿4500万人),流动人口更多的从农村流往城镇,尤其是地方的小城镇。

全国层面的人流倾向在大都市上海表现的尤为突出。表4反映了2000年以来上海市外来人口居住空间的变化情况。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我们先把上海分成市中心9区、浦东新区、近郊3区、远郊5区和崇明县,再来考察各区外来人口的构成变化及各区外来人口总量的增减速度。在2000~2008年的8年中,外来人口增加了200多万,但市中心9区外来人口的总量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减少倾向,浦东新区的增速也相对较慢。相比之下,郊外

各区外来人口的增速却要快得多。有趣的是,郊外各区外来人口增加呈现了十分明显的梯度变化倾向,即在市中心9区不再有参入空间之后,外来人口便大量进入浦东新区,再向近郊3区推进,直到远郊5区、崇明县。其结果是,市中心9区外来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浦东新区基本持平,而居住近郊、远郊乡镇的外来人口比重稳步上升。

市内的住房紧张,生活费用昂贵,有效的就业机会又不足,所以,外来人口流向郊外本身是个十分合乎情理的结果。但必须承认,外来人口大多流往郊外、居住在城市的边缘,与现行的农民工政策有关,其中包括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的不利影响。在这里,我们没法判断外来人口流入上海后的职业流动和迁居情况。要是大多数人能在工作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经验或知识积累,逐步实现从低工资向高工资、从非正规部门向正规部门的流动,我们应该说劳动市场的功能是健全的。但事实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大多数外来就业人口似乎只能停留在都市的边缘空间,在劳动市场的最底层打工糊口,过着一种与现代都市文明不太相干的单调生活。

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

表4

	流动人口总数及居住地区别构成				期间增长率		
	2000年	2003年	2005年	2008年	2000~2003年	2003~2005年	2005~2008年
流动人口数(万人)	387.1	498.8	580.2	517.5	28.8	16.3	18.1
市中心9区(%)	33.6	26.1	21.8	18.1	0.1	-2.9	-4.0
浦东新区(%)	18.9	20.5	17.6	18.1	39.7	-0.1	18.8
近郊3区(%)	28.7	31.6	33.1	31.0	41.9	21.9	10.3
郊外5区(%)	17.4	20.7	26.6	31.0	53.4	49.3	44.1
崇明县(%)	1.4	1.1	1.2	1.8	0.2	24.5	64.0

注:1. 2000年、2005年为人口普查数据、2003年根据第7次上海市流动人口调查推算。数字为在上海滞留2天以上的所有流动人口。2. 2008年为常住流动人口。3. 2005~2008年为常住流动人口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电子版))

3 外劳的就业与收入

众所周知,农民工主要在制造业、建筑业、餐饮及零售等服务性行业工作,诸如工作强度大、加班加点多、工资水平低、社保内容差等,都是经常被用来描述农民工工作作风的术语。近年来,随着劳动合同法等法规的实施,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有所变化,但由于民工问题根深蒂固,有些问题还远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下面,我们利用有关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工资待遇。

3.1 外劳的工作时间

这里,我们利用2003年、2009年上海社科院人口所对上海就业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比较分析包括非农户口在内的外来劳力的工作时间变化,并把它与户籍居民的进行对照。图5基于汇总数据制作,其中图5a表示男女、不同年龄层人口的月工作天数,图5b表示每天的工作时间。

第一,2003年调查中的外来就业人员,平均每月要工作28.1天,而户籍居民只有22.0天。外来就业人员基本上没有定期的休息日,但绝大多数户籍居民可以享受周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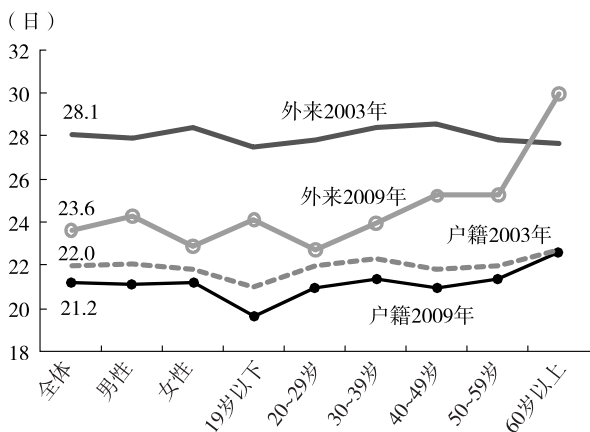


图 5a 每月的平均就业天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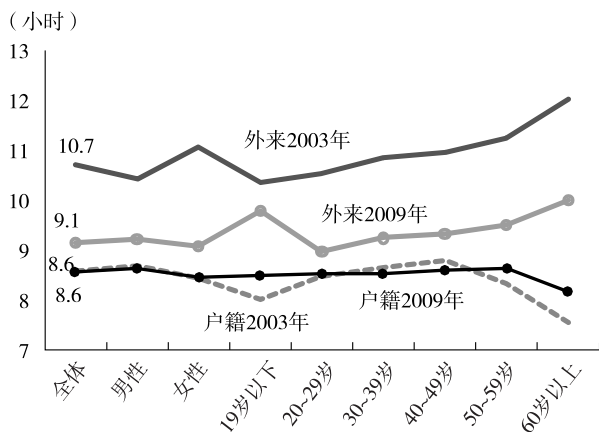


图 5b 每天的工作时间

(资料来源:根据2003年、2009年上海就业情况问卷调查汇总)

两天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外劳与户籍居民间的就业差异存在于各个年龄层和性别之间,外劳处于绝对的劣势。

第二,从每天的工作时间来看,两个群体之间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在2003年调查中,外劳的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0.7小时,而户籍居民仅有8.6小时。不同性别、年龄层之间的差距与总体大致相同(样本数较少的50岁以上人口,差距稍大一些)。

第三,2009年调查中,所有这些情况都发生较大的变化。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规全面实施,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人们对法定休息日、法定工作时间的概念日趋清晰,用人单位也不得不改善工作条件。外劳的月工作天数、每天的工作时间大幅度减少,与户籍居民的差距也大大缩小。

从工作时间的长短及其变化情况看,农民工等外劳的工作状况改善较大。对此,我们应当给予较高的评价。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被平均数掩盖了的一些问题。比如,在2009年调查中,依旧有32%的外劳每月工作23天以上,有1成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日;外劳中34%的人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而同一指标户籍居民仅占15%。

3.2 外劳的收入及其变化趋势

关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在20世纪80~90年代,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的民工工资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实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增长^①。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住户调查以及农业部的固定观察点调查也表明,在2000年以后,农民工的名目工资年均

递增7.9%,大大低于同期城镇居民的14.9%。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工的相对收入从2001年的70%急剧下降到50%左右^②。

上海外来就业人员的情况如何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历次上海市的就业调查数据进行了整理,得到了1995~2009年间外劳的人均月收入、不同年龄层的收入水平、与户籍居民相比的相对收入以及初次来上海工作时的收入。图6是对有关数字进行可视化处理的结果。下述乃图6展示的主要结果。

第一,自1995年以来,上海市外来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无论是名目值还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值,都有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995~1997年、1997~1999年、1999~2003年、2003~2005年、2005~2009年的5个时间段内,人均月收入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4.6%、11.4%、8.5%、12.4%、7.5%(按1990年物价为基准计算)。这个结果否定了人们对民工收入的一般性认识。它告诉我们,至少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劳,其实际收入在不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也不是太慢。

第二,从不同年龄阶层来看,收入的上涨幅度有较大的区别。在各调查中,收入曲线都呈现了倒U字形。在1990年代后期,这种形状不是太明显,收入与年龄的关系不是很强。但自2000年以来,收入曲线的倒U字形渐渐显现。这可能表明,内涵于工作经历的人力资本随时间推移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外劳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对熟练工的要求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对

① 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本文系作者提交中改院主办“中国农民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的论文),2003年。
② 根据蔡昉编《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资料计算。

此进行调节的机制也在不断健全。

第三，虽然外劳的实际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与户籍居民相比，其相对水平不高，近年来还有所下降。这个倾向与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结果基本一致。我们不排除外劳与户籍居民在能力方面的差距（如学校教育的年数）所产生的影响，但也要注视制度歧视带来的效果。先前的有关研究表明，来自后者的成分不可否认^[12]。

第四，外劳初到上海的收入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加，2000年以后的增速有所加快（图6d）。在2009年调

查中，社区样本991人，企业一般508人。按他们第一次到上海打工的年份统计，1990年前来沪的仅有61人。为了避免人数过少带来的偏差，这里我们主要分析1990年以来初始收入的变化倾向。从图中可以看出，到2000年左右为止，社区样本与企业样本的初始平均收入相差不多，增加速度也大致相同。但在此后的数年中，企业样本的初始工资明显高于社区样本，直到2009年，两者才基本持平。这可能与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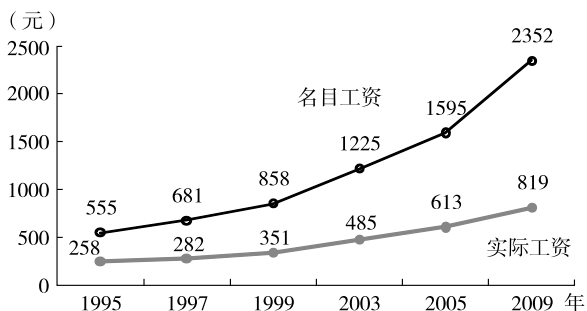


图6a 外劳的平均月收入 (按1990年CPI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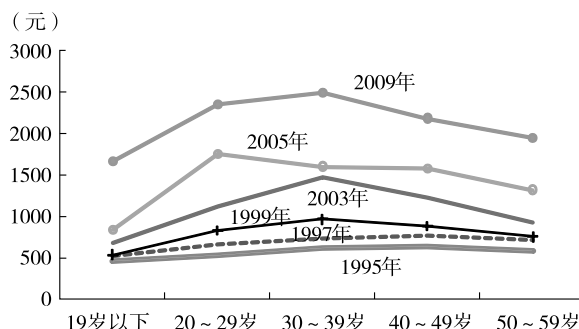


图6b 外劳的年龄别平均月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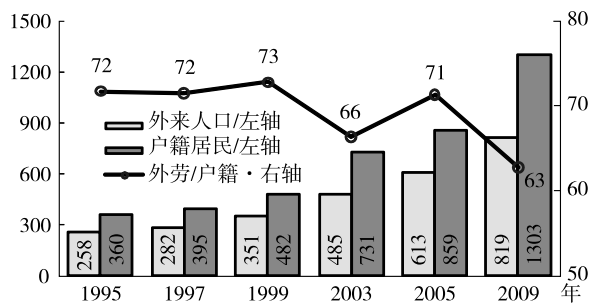


图6c 户籍居民与外劳的收入差距 (实际工资按1990年CPI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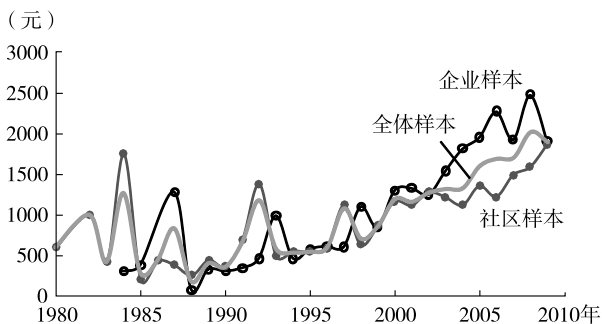


图6d 外劳在上海工作的初始月收入

注：a、b、c中2009年的外劳为社区样本的汇总结果。d为2009年外劳就业情况问卷调查数据。问卷的提问是：你哪一年第一次来上海工作？当时的月工资是多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制作。户籍居民工资、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自上海统计年鉴(电子版))

4 简短的小结

最后，我们对本文的分析结果做一个简短的小结。

第一，1990年代以来，上海市的常住人口迅速增加，但增量的绝大部分是那些没有上海户口的所谓外来流动人口。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外来人口中的农民，或外来就业人口中的农民工比率急速上升。进入2000年代后，两者分别占总体的8成左右。

第二，外来流动人口以及外来就业人口大多集中在20~39岁的中青年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占比最大的年龄层逐渐向上滑移，平均年龄有所增加。

第三，外来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增加十分缓慢，14年中只上涨了3岁。主要原因是，在流动人口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年轻人的大量参与，另一方面是年长者的回归农村。这个过程与户籍等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有关。

第四，在1990年代中期，地区间流动人口的年龄分

布较广，平均年龄较大。后来，流动人口呈现了明显的年轻化倾向，那些既没有务农经验，或许也没有务农意愿的初高中毕业生构成了流动人口的主体。

第五，外来就业人口的教育水平显著上升，未满30岁的外劳尤为突出。同时，外来就业人口之间的文化程度差距有缩小趋势。可以说，总体水平高、素质较为整齐的外来劳动力为产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外来流动人口在上海市的居住时间呈长期化倾向，但他们的居住空间却越来越边缘化，大多数人只能过着一种与现代城市文明不太相干的单调生活。他们虽然到了上海，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都市社会。从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搬进了城市，城市里出现了户籍居民和流动人口构成的新型二元结构。

第七，2000年代以来，外来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大幅度缩短，与户籍居民的差距也在缩小。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变化。但另一方面，外劳的收入增长缓慢，相对于户籍居民的收入还在下降。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大批外来就业人员，似乎还没有充分享受经济成长的果实，其主要原因，还是那个基于户籍等制度性的农民歧视。

通过对上海市外来人口和农民工的动态分析，我们有理由指出：在中国，那个被称为农民工的庞大群体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近年来，民工荒时常出现，很多企业为此而慌。为了应对快速的人口转换，中国有必要加快修正有关民工政策，让外来流动人口或外来就业人员真正能在城里定居下来，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彻底完成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参考文献

- [1] 张开敏. 上海人口迁移研究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 [2] 王午鼎. 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3] 张声华. 上海流动人口的现状与展望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 [4] 严善平. 中国的人口移动与民工 [M]. 劲草书房 (日文), 2005.
- [5] 莫建备. 融合与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16城市农民工调查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6] 钱文荣, 黄祖辉. 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长江三角洲16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调查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7] 周海旺. 从管理到服务: 发展趋势与融合前景 [M] // 阮丹青主编. 重塑上海人.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 [8] 高慧, 周海旺. 上海外来与本地劳动力收入差异及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07 (1).
- [9] 严善平.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 [J]. 管理世界, 2006 (8): 10-19.
- [10] 严善平. 人力资本、制度与工资差别——对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J]. 管理世界, 2007 (6): 4-12.
- [11] 严善平. 地区间人口流动的年龄模型及选择性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3).
- [12] 严善平. 从农村到城市——1亿3000万人农民大移动 [M]. 岩波书店 (日文), 2009.